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考古》的历程

——纪念《考古》创刊60周年笔谈

王 巍 仇士华 卢兆荫 白云翔 朱乃诚 朱凤瀚
任式楠 刘庆柱 许 宏 杜金鹏 杜德兰 李学勤
张长寿 陈星灿 杨 泓 赵 辉 施劲松 宫本一夫
袁 靖 高 星 黄展岳 梅建军

关键词：《考古》 60周年 中国考古学 发展历程

KEYWORDS: *Kaogu* (Archaeology, the academic journal) 60th Anniversary Chinese Archaeology
Development Process

ABSTRACT: Since the starting of publication in 1955, *Kaogu* (Archaeology) has bee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serving the studies, prospering the studies and guiding the studies for sixty years, during which the journal also gets matured and makes progresses, and contributes the archaeological causes of China. The *Kaogu* in the sixty years also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the changes of the time. The essays in memory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Kaogu* organiz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are the retrospection and memorial of the past and also the perspective of today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future.

王 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今年是《考古》创刊60周年。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作为主编，我的心情十分激动。60年来，《考古》由一个主要报道考古工作信息的通讯类刊物，发展成为现在的国内首屈一指、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顶级专业杂志，期间经历了一次次社会动荡，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酸甜苦辣，艰辛磨难，只有亲历者才会有切身的体会。60年来，《考古》共出刊579期，刊发文稿总字数大约8500多万。以近15年为例，每期刊发文章10篇左右，论文和考古发掘简报大约各半，15年共刊发文章1800篇左右。作为《考古》的

现任主编，我首先要对60年来为《考古》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历任主编夏鼐、安志敏、徐莘芳、乌恩和历任副主编陈梦家、卢兆荫、白云翔、施劲松以及《考古》的几代编辑同仁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忱！

我与《考古》结缘，始自1977年秋季恢复的高考。当时，我第一志愿报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顺利被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马上到长春市新华书店的古旧书门市部去购买《考古》杂志，买到了1972年《考古》复刊之后到1977年的。对考古还几乎一无所知的我就是通过阅读《考古》，

开始对考古学有了十分初步的了解。

进入大学学习考古之后,我对《考古》的学术地位有了逐步深入的了解。我发现,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都是在《考古》上发表简报,许多重要的研究论文也是在《考古》发表的。那时,我心里就对《考古》有一种十分崇敬的心情,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有朝一日也能在《考古》上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论文。

1982年2月1日,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工作需要和我的学术兴趣,我到了商周考古研究室的北京队,参加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和城址的发掘。我参加撰写的第一篇成果是《考古》1984年第5期发表的《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我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考古》1986年第11期发表的《良渚文化玉琮刍议》。迄今为止,我的主要的学术研究文章都是在《考古》发表的。我是在《考古》发表的许多前辈们的文章中了解学术信息、汲取学术营养、学会学术话语、掌握学术规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考古》是帮助我及像我这样的一代代后学成长的良师益友。

1998年夏季,我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考古》主编。打自那时起,我和《考古》的关系有了变化,不仅仅是读者、作者,还是编者队伍中的一员。我了解到了《考古》工作的程序,也体会到了《考古》编辑们工作的艰辛。一篇篇发掘简报、学术论文,从通过几轮审稿,到作者几回修改、再到几次编辑校对,最终文章发表时与最初提交给《考古》编辑部时相比,无论是文字的表述,还是插图、图版的编排,甚或是某些观点的阐述,往往是“今非昔比”有很大的变化和升华,有的稿子甚至可以说是“面目全非”,其中浸透了审稿学者和《考古》编辑部负责文字、插图和图版、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的同仁们的心血。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中

国考古学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考古调查发掘的数量显著增加,研究手段与方法日益丰富,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对外以及国内各个单位和系统的合作逐渐广泛,研究水平和社会上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使中国考古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考古学的发展,对《考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这一发展变化,促进中国考古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考古》编辑人员群策群力,想出了很多好的办法,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仅我担任主编以来的改革就有以下几项。

1. 强化编辑规范、完善编辑工作制度。

2. 丰富和完善栏目设置,明确各栏目的定位与要求;设置“新发现·新进展”栏目,介绍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调整“读书与思考”、“考古与科技”、“学术动态”等栏目,不断增强刊物的学术性。

3. 加强选题策划,发挥引领作用。为促进各省市自治区的考古工作,我们创立了省区专稿,每组刊发一个省市自治区的考古专稿,包括数篇重要考古发现的简报和研究文章。省区专稿的设置,极大地调动了各省区同行们投稿的积极性,使一大批重要的考古资料得以较快地发表,有力地促进了各省区考古事业的发展。2001~2004年,《考古》共刊发省区专稿27组,有河南、江苏、广东、湖北、山东、江西、河北、湖南、西藏、辽宁、浙江、云南、安徽、山西、新疆、宁夏、上海、青海、黑龙江、海南、甘肃、吉林、广西、福建、北京、四川、贵州等省区。

4. 2004年后,《考古》进一步发挥刊物的主动性和引领作用,开始重点围绕学术专题和考古新发现策划和组织刊发成组专稿,更加全面系统地介绍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2004年以来的重要成组专稿有每年度的“中国考古新发现”,以及“二里头考古”、“偃师商城考古”、“汉长安城考古”、“殷墟考古”(共三组)、“香港考古”、“考古学与

大遗址保护”、“南水北调工程湖北段考古新发现”、“南水北调工程河南段考古新发现”(共两组)、“南京六朝墓”、“新砦考古”、“北方青铜文化墓葬”、“渤海考古”、“盐业考古”、“辽代考古”、“纪念仰韶遗址发掘60周年”、“史前城址考古”、“西域考古”、“实验室考古”、“佛教考古”、“汉代土墩墓”、“瓷窑考古”、“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土司考古”、“中华文明探源”(共四组)等近50组专稿。

5. 2007年以来,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以确保发表文章的学术质量。

6. 自2009年起,每期文后图版由8版增为12~16版,并增印抽印本,通过中国知网全文上网。自2013年起,实行全彩印,页码由96页调整为104页。2015年,刊物扩容,由104页调整为120页。

这些改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学界的好评。

在《考古》几代编辑的努力之下,在全国考古学界同行们的帮助和支持下,《考古》取得了一些进步,获得了一些奖励。先后荣获“'95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1995年)、“中

仇士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鼐先生曾评说:“世界上好些地区的史前年代学,由于有了 ^{14}C 测年方法而引起了很大的变革,人们称之为‘放射性碳素革命’。我国也由于 ^{14}C 测年方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有了时间关系的框架,使中国的新石器考古学有了确切的年代序列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4}C 测年方法经过长期改进和完善,测定精度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建立了高精度的 ^{14}C 年代-树轮年代校正曲线。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从龙山文化到西周在时间上紧密相连,文化分期也比较清楚,所以

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一等奖”(1999、2002、2006、2008年),被评为“全国百种重点期刊”(1998、2003、2013、2015年)和“双百期刊”(2001年)。特别是2011年,获首次设立的“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是十个获奖社科期刊中仅有的三个学术期刊之一。近两年,《考古》均被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考古》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强。我出访世界各个主要的考古研究机构和大学,往往都可以在他们的图书馆或资料室的期刊架上看到橘黄颜色封皮的《考古》。每当此时,作为《考古》主编,我都会感到十分欣慰。

《考古》发展到今天,取得的上述进步和成绩,归功于几代《考古》编辑的不懈努力,归功于杂志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各个部门的密切配合,更要归功于全国考古学界同行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作为现任主编,我要向《考古》的作者、编辑以及对《考古》成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的所有人表示诚挚的感谢和由衷的敬意!也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使《考古》永葆青春,为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可以按田野考古层位和文化分期采集一系列有确定年代的代表性样品,测出一系列高精度 ^{14}C 年代数据,用高精度的 ^{14}C 年代-树轮年代校正曲线同时做树轮年代校正。因为这些样品在考古上有相对的时序,同时做树轮年代校正时能相互制约,因而校正后样品的日历年代误差可大为缩小。这被称为“考古系列样品测年方法”。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就用此法测出了从龙山文化直到西周的大量 ^{14}C 年代数据。经系列样品方法研究,在各阶段都有比较精确可靠的特征年代数据作为支柱,组成了从龙山文化至西周晚期年代误差大为缩小的考古年代框架。例如,根据晋侯墓M8

测出晋献侯苏的年代为公元前808±8年，同《史记》记载相合；根据沔西遗址测出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050~1020年；根据殷墟的测定，一期晚和二期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261~1195年，完全支持天文推定的武丁年代在公元前1250~1192年；测定二里冈文化上层一期偏早的原编号为98ZST1J3S2水井的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400±8年；根据郑州商城和二里头遗址测出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分界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500多年；根据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分界年代在公元前1700~1680年间，可以推定二里头一期的

卢兆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自创刊至今，已届耳顺之年，值得热烈庆贺！它是建国后最早发行的考古学期刊，作为主要公布考古调查、发掘简报和研究成果的平台，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考古》的发展历程，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过程的缩影和真实反映。

60年来，随着我国田野考古规模的不断扩大、重要遗址的陆续发现和发掘，新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大量出土，考古学研究水平也相应地不断提高，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与日俱增。在广大读者和作者的大力支持和爱护下，《考古》的内容质量和编辑水平也不断地有所充实和提高，尤其是近几年的发展更为显著。例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60年过去了，《考古》（时称《考古通讯》）已经从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60年间，有过风雨，有过艰难和曲折，但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它始终在茁壮地成长、不断地进步。在纪念创刊60周年之际，作为既是读者、又是作者并且还曾经是编者的我，在感慨“岁月如歌”的同时，更多地是对今天和

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根据新砦遗址的测定与研究得出新砦文化期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850~1750年间；登封王成岗大城的年代应在公元前21世纪早中期；陶寺龙山文化的早期，经长期测定表明不会超过公元前24世纪。

上述一条链式的、比较细致可靠的考古年代框架，以及丰富的考古内涵，对结合古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是极为有利的。与此同时，同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相当的庙底沟二期考古文化，也值得考古界予以更多的关注。如果无视考古年代框架进行研究，可能会走弯路。

如，2013年在编辑体例上的改进，将原来集中在刊后的图版改为随文发表，刊物的篇幅也由96页增加为104页；2015年，随着稿量的不断增加，刊物的篇幅又增至120页。

《考古》1995年荣获首届“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奖”，1998年被评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之一，此后多次荣获优秀期刊奖。作为长期在《考古》编辑部工作的人员，回顾《考古》60年来的发展历程感到由衷的欣慰。我于1978年到编辑部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又返聘回编辑部，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考古》堪比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奇葩，我谨以“护花”的“春泥”自勉之。

明天的思考和期盼。

《考古》杂志作为我国重要的考古学期刊之一，如何做好今天、更好地走向明天？我想起了夏鼐先生30年前对办好《考古》提出的要求：“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下手”。那么，什么是“大处”呢？在我看来，就是我国考古事业的大势，考古学发展的大势。

当今我国的考古事业，不仅与60年前相

比不可同日而语，即使跟30多年前相比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譬如，我国的文化遗产事业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和民众的关注，而考古事业又是其极为重要的一环。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结合日益紧密，因考古发掘和研究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遗址和古墓葬日趋增多，全国范围内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方兴未艾，文物保护已经成为各考古文物研究机构的日常工作之一。全国的考古研究机构日益增多，不仅各省、市、自治区都设有专门的考古文物研究机构，而且许多地、市也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考古队伍迅速壮大，中国考古学会现在拥有120多个团体会员，个人会员已多达2200余人。考古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建成，全国不仅有近20所高校拥有从本科生到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体系，而且还有30多个高校培养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

就考古学来说，学科建设逐步完善，考古学已经不再是历史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已经成为与中国史、世界史等比肩的一级学科。考古学的学科理念不断进步，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已经从文化谱系的构建等转移到古代文明和古代社会历史的全面阐释，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展，学科体系正在逐步完善。田野考古工作正在从以抢救性考古发掘为主战场向着抢救性考古发掘和主动性考古发掘并行、并重的方向演进，学术研究、科技融合、文物保护、展示利用的“四位一体”格局正在成为田野考古的新常态。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不断进步，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应用于考古发掘和研究，科技考古迅猛发展，多学科合作研究逐步深入。长期以来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积累的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内涵丰富的田野考古资料，正面临着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的任务。我国的考古文物类专业性学术期刊，也已经由《考古》创刊时的3种增

加到近20种，同时还有10多种不定期连续出版物。考古学已经不再仅仅是“象牙塔”中的学术研究，而是正在逐步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考古学，已经成为我国考古学界的历史使命，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考古事业发展的总体态势。

就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已经并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无论学术理念、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范式、手段等，都已经跨越了单向从国外引进、吸收和借鉴的“学习”阶段，与外国考古学开始了真正的“对话”和“互动”。中国考古学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正在日益深度地融合于世界考古学体系之中。当然，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中国考古学真正走向世界还任重道远。

上述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新的态势，既是机遇，更是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全局，洞察态势，顺应潮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准确定位，突出特色，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让《考古》杂志在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服务学术、繁荣学术、引领学术”的作用。

“大势”在变，我们的刊物“应势而变”是必然的，但我们还应当坚持“不变”，这就是继承和发扬《考古》60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严谨、求实、扎实的学风，更是应当始终摆在办刊的首位，坚持不渝。1984年5月，夏鼐先生在为“《考古》二百年纪念”撰写的《回顾和展望》一文中说：

“我们要实事求是，要慎重，不要把太不成熟的甚至于错误的东西拿出来充数。研究论文一般都要能实事求是、条理清楚、逻辑性强，有说服力。田野考古简报也要提高写作水平，文字部分要写得有条理，明白扼要，还要能说明问题”（《考古》1984年第5期第387页）。30年过去了，但夏鼐先生的话并

没有过时，尤其是事业大发展但学风并不尽

如人意的今天，更值得我们牢记。

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自1955年创刊（创刊名《考古通讯》，1959年更名为《考古》）以来，已历一甲子。这是值得庆祝的。60年来，《考古》重视及时发表第一手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原创资料以及重要的研究理论文章，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从1975年开始阅读《考古》，从中获益匪浅，是我不断成长的良师益友。集40年学习《考古》的体会归纳为一点：《考古》一直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组稿发文，因此能够不断地引导着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发展，从而被公认为中国考古学最为权威的学术刊物。

回顾近百年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各个重要的考古发现是中国考古学学科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点，而理论与方法以及技术与手段的发展，是引导考古学飞跃发展的重要标识。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技术与手段正在不断地完善，尤其是近

30年来多方位引入的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运用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对考古学的各种形式的渗透，中国考古学的技术与手段，已经非昔日可比。这只要看看近30年的《考古》便历历在目。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标准化，远远没有达到。虽然在政府部门的倡导下，在一些科技考古、文物保护、考古辅助工作等领域中初步开展了标准化的工作。但在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方面，尚未进行标准化的探索，尤其是在考古类型学这一主要研究方法中，尚未引入标准化展开研究，致使考古类型学这一重要的方法在近20多年来发展缓慢。考古类型学研究向标准化发展，应是中国考古学进一步向科学化发展的重要方向。相信这也将是《考古》引导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又一重要内涵。

朱凤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考古》杂志到今年已创办60年整，在见证与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半个多世纪发展历程的同时，自身也成长为中国考古学界乃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国内外最负盛名的学术刊物。对于我个人来说，尤其对《考古》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里想讲一下我与《考古》亲密接触的两件事情。首先要说的是，正是《考古》引领我走进学术殿堂。还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刚从下乡知青选调为科尔沁草原深处一个偏僻小城的中学教师，在当时极端缺乏学术气氛、期刊架子上学术刊物几乎空空的时候，经“文化大革命”而刚复刊的《考古》，在非常枯闷的环境中，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向学术绿洲的门户。我最初的考古知识，完全是从仔细地阅读《考古》上发表的简报与学术论文获得的。而且，我的

第一篇初出茅庐的文章，对内蒙古哲盟大沁他拉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作踏查的简报，也是在《考古》杂志发表的。20世纪70年代中叶，对我这样一个仅依靠自学而希望能走入考古领域的青年的来稿，《考古》编辑部的徐元邦先生并未因其浅陋而弃之，而是认真地审阅，且将这篇稿件交给安志敏先生，安先生特意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帮助我修改文章。后来，这篇简报在1979年第3期的《考古》上获得刊登，我记得当时《考古》好像才刚刚恢复了稿酬制度，我高兴地获得45元稿费，使我有盘缠得以去张家口地区张忠培先生主持发掘的庄窠遗址工地学习。要讲的第二件事是，2007年初，我从香港获见对属“夏商周断代工程”重要课题的西周金文年历研究有极大影响的西周青铜器

铭文，当时断代工程正在讨论结题报告，为能早日使学界了解这一重要资料，我求助于《考古》杂志主编王巍先生，王先生遂请副主编施劲松先生处理，在当时第3期稿件已安排满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将我介绍这篇重要资料的论文及时地刊于这一期中。这篇文章所提供的信息，使得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立即在清华大学为此专门召开了一天的研讨会，并对《考古》杂志的支持给予了深切的感谢。也正是这篇铭文所附载的新信息，不仅促进了对西周金文历谱的新思考，而且对于进一步深化对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认

任式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为回顾《考古》历程以纪念《考古》创刊60周年，骤生一念，不揣冒昧以“夏鼐与《考古》期刊”为题，以体现夏鼐对《考古》创办、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主要通过撷取《夏鼐日记》中素材，希望能勾划出一个并非完整的轮廓，现归纳为三方面表述。

一、组织领导，深入工作。1954年春，经过本所领导的考量和在研究人员中的酝酿，5月19日，郑振铎所长正式与夏鼐商谈《考古通讯》及《报告集》问题。5月31日，夏鼐约请北京大学、社管局、本所共6人开会筹备创办《考古通讯》。7月7日，由郑所长主持召开《考古通讯》编委会，夏鼐被推定为该刊主编。从此，夏鼐作为所领导主管，围绕办刊长年累月持续地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主要包括调配编辑人员力量、商定编辑方针要求、审定工作计划、审阅稿件、决定用稿、校阅校样、对外要务联系，等等。除经常性工作外，自创刊以降，夏鼐又在期刊更名改版、扩容增期、复刊再起、纠正一度偏差重上正轨等几个节点上，他身处独特位置，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他切实担当主编职责，十分重视校阅（审阅）期刊校样，按期细查纠正，一丝不苟。偶有在一期校样上，他查

识与寻找作为唐叔初封地的唐国遗址都有重要启示意义，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李伯谦先生曾有专文论述这篇铭文的学术价值。我从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两件事例，深感《考古》所具有的对作者、对考古科学高度负责的精神。最后，我衷心祝愿《考古》在未来能一如既往地热情培养立志为中国考古学献身的青年学子，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能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更关心、更及时地报道有助于考古学发展的属于学术前沿的新资料、新成果，在推动考古学科的学术创新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出并订正差错有数十处，还曾明示编辑部开会，重申编辑质量要求。夏鼐面对已出版期刊上的文字差错也不回避，曾将读后的《考古》1963年第4~11期、1982年第1期写出两份勘误表交给编辑部，从这点滴处也可反映出他的一种责任和耐心。

二、审阅稿件。夏鼐审阅《考古》各类稿件数以百计，日记中记录有相当数量稿件的作者姓名、篇名，分别冠以“审阅”、“审查”、“阅”字样。一般由编辑部择要交他待审稿；也有些是作者面呈，他阅后则当面还给作者并谈及意见；个别为作者邮寄给他，他往往专有信函回复。无论哪种方式，他通常都有书面意见。我们有切身体会，夏鼐审阅各类文稿所写意见和批注，大小问题都很具体、准确，既抓住论点、论据、提法，同时涉及文理、结构、技术性方面。对所内有些稿件还直接加以修改。夏鼐一生对众多作者、单位集体的大量文章、书稿（有些属所外委托审稿，不是致本所的投稿）的审阅意见和批注文字，实是一笔丰富的学术资料遗产，我们现在难以见到。而从日记中，他对很少的《考古》稿件，留下寥寥数语的评说，实属难得。

1960年6月2日审阅张勋燎的《〈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一文》的商

榷》，认为“批判许顺湛的各点甚是”。后该文刊于《考古》1961年第9期。

1973年8月13、14日，针对河北省博、省文管处来稿《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所记铁刃铜钺这件极重要文物，专写了千余字的《读后记》，指出“似乎并不排斥这铁是陨铁的可能，还不能确定其‘系古代冶炼的熟铁’”；最后提出“我们以为这次所发现的青铜利器的铁刃是否系冶炼的熟铁，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读后记》附在该考古简报篇末一并发表在《考古》1973年第5期（9月份发行）。之后，夏鼐与国家文物局、简报作者及科技院校研究单位等几方多次联系洽谈，最终于1976年年中发表了权威的鉴定研究论文，完全证实了夏鼐最初的论断。从中可见夏鼐的学识、科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探究精神。

1977年11月30日审阅孙作云的《古代器物纹饰所见的动植物》，认为“有许多以图腾崇拜来解释，殊嫌牵强，建议退稿”。

1983年9月11日审阅杨泓的《日本古坟时代甲冑及其和中国甲冑的关系》，“签注些意见，此文值得发表，并且估计发表后日本方面便会立即译成日文”。后该文载《考古》1985年第1期。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创刊60周年之际，我们以笔谈形式进行纪念。就是在我动笔的时候，我看到60年前的今天——1955年5月31日的一份历史资料：文化部社管局、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考古所会议室联合举办了“筹备《考古通讯》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夏鼐、向达、苏秉琦（代表翦伯赞）、高履芳、谢元璐，夏鼐先生主持会议。夏鼐先生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考古通讯》是联系全国各地从事文物工作的考古工作者”的刊物，《考古通讯》的任务是“刊载新的发现和交流工作（考古

1983年11月10日，“阅曲贵春《璇玑考辨》稿，乃《考古》编辑部送来，约16000来字，退稿给编辑室，请其另找人审查。他仍坚持‘璇玑’乃天文仪器之说，无可理喻，又以‘兼与夏鼐同志商榷’为副题，不便审稿也”。

学术期刊的核心支撑当在积累有质量、高水准的学术作品。夏鼐审稿把关，是期刊得以保持较高水平的重要环节，同时他对来稿中的许多作者进行了切实帮助、指导。

三、个人撰文。在《考古》上，载有夏鼐的论著、综述46篇，中外图书评介11篇，中外人物传略、纪念9篇，大会讲话1篇，目录索引1篇，其他6篇。其中少数文章署名作铭、竺敏。此外，还有他撰文和译文而以另一种方式刊发的若干篇。夏鼐发表在该期刊上的多领域研究成果，是他整个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提高了该期刊的学术品位和影响力。

总之，夏鼐为《考古》的创办、发展，殚精竭虑，真诚奉献，由他奠定了坚实基础，树立了办刊优良传统，带出了编辑人才团队，促进了学术繁荣并扩大了学术传播，后人从他办刊的这段历史中，总能受到感悟、教益和激励。

学学术研究方面）经验”。为了保证刊物的“全国性”、“学术性”，夏鼐先生提出由郑振铎、夏鼐、翦伯赞、向达、尹达、裴文中、吴晗、王冶秋及各地的代表曾昭燏、李文信、冯汉骥、陈尧庭等先生组成《考古通讯》编委会。为了办好《考古通讯》，夏鼐先生还提出由文化部社管局、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考古所三家共同组成编辑部，只是由于有的先生认为教学任务繁重无法承担，编辑部的组成最后只好落在考古所身上。夏鼐先生当时对《考古通讯》的定位与其所确定的办刊方针，60年来我们一直遵循，从而使

《考古》（即《考古通讯》）经过一个“甲子”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中国考古工作者真正的“学术家园”、成为引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学科旗手”、成为世界学术界认识中

国考古学的“科学园地”、成为中国科学的一张享誉世界的“科学名片”！6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是短暂的一瞬，但是《考古》人会一代又一代使之健健康康的发展！

许 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目前，中国考古学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看，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转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而从研究主体，即研究者群体状况的角度看，我们正步入“后大家时代”，必须准备迎接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断奶期”。在这样一个学术权威缺失、学术思维多元化、充满活力的变革时代，学界需要充分的讨论和思想的碰撞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从而推进学科的发展。而这个讨论和思想碰撞的窗口，就应该是学术刊物。

《考古》在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曾经起到了导向和引领的作用，担负

起了其应有的学术责任。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学科分支的不断细化，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碎片化”的倾向，我们的学科也不例外。对具体遗存、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当然不能偏废。在目前学科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具有示范意义的田野考古报告、简报的选用外，还应加强对关涉学科发展前途的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加强对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推介，鼓励相关理论方法本土化实践的探索，加强学术史的研究，开展健康的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这是学术之需、时代之需，是推进中国考古学学科稳步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杜金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月刊历来以“高”、“稳”著称，即对作者和编者要求高，务求发表的作品都具有较高水平，务使所有作品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其形象风格，则尽量淡雅、稳重，从而树立一个朴实无华的纯学术刊物形象。

为使《考古》吸引更加广泛的读者，更好地为日新月异的考古学服务，建议编者在“新”与“活”方面更上一层楼。

文化遗产保护正成为考古界的学科核心任务之一，考古遗址、发掘现场、出土文物必须及时和有效保护，日益成为考古界的共识。但是，我国考古领域里的文化遗产保护，其理论与方法、技术的研究，还在初步

阶段，因此有必要大力倡导和扶持，以使我们的考古学科在文化遗产科学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亦即，要在传统的考古研究领域之外，加强对文保领域科研成果的报道介绍，促进考古活动中的文保工作。这是一个新的领域，而本刊有关考古资产保护和实验室考古的报道，已经有了良好开端。

另外，在内容、版式、文风方面，也可适时、适当灵活变化，在严肃的学术舞台上，有多种流派的剧目呈现。

但，希望《考古》万变不离其宗——严肃学术刊物的定位，高质量高水平的要求，认真周到的服务。

杜德兰（Alain Thote）（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自1955年创刊以来，《考古》经历了它“人生”的数次蜕变，今天走到了令人敬

重的耳顺之年，成为国际知名的优秀刊物。60年来，《考古》的每一期上都会发表发

掘报告，其中不乏引起轰动的重大考古发现，也发表居于学术前沿的研究成果。《考古》的这一惊人进步是与中国考古学的整体发展同步的。今天的它更加开放，也面对着新的课题。就商周时代而言，它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从中我们持续了解到该领域的重大发现，如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殷墟洹北、安阳花园庄东地等遗址。西周时期则有渭河流域、长安、沔西、扶风、岐山以及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等遗址的考古报告。东周阶段又有山东临淄齐故城、陕西秦都雍城、河南商丘宋国故城及湖北宜城楚皇城等诸侯国都城遗址与大墓的发掘简报。由此，

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

《考古》创刊60周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都应该表示祝贺，希望这一刊物越办越好。我个人有三点小小希望，写在这里，不知是否恰当。

第一个希望，是《考古》能更多更及时地组织和刊登考古新发现的讯息与简报，使读者得以更迅速地了解学科进展的现状。范围自当以国内为主，可能时也介绍一下世界各地的新发现及研究成果。

第二个希望，是《考古》能更多地提倡言简意赅的研究文章。近年有的学术论文越来越长，有的长到令人实在没有办法读完，可是

张长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我是1956年调来考古研究所的，之前《考古》杂志已发行一年多了，起初称《考古通讯》，为双月刊，后改为月刊，更名《考古》，至今已创刊60周年了。

《考古》原为资料性刊物，经过几代人的培育，如今已茁壮成长成为考古研究所、乃至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学术性刊物。

夏鼐先生和老一辈的专家对《考古》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夏所长对当时考古界的学术问题每每著文指明方向，如《关于考古学上文

我们对前帝国时期文明的认识有了显著的进步，相关研究也愈加深入、细致。今天的《考古》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也拓展了新的领域，其中科技考古的地位尤为突出。它也是介绍和研讨最新考古学科理论、特别是田野发掘方法和视域的主要阵地。今后的《考古》也应该为那些不怎么轰动的、但具有重要价值的考古发现留出一席之地，也应该关注青铜时代居民日常生活研究，如居住模式、村落构造、聚落分布、环境及古代景观的变化等。这应该是中国考古学、也是《考古》杂志未来的发展方向。祝《考古》永葆青春。

仔细看来，不少长文其实完全是可以压缩的，写短一些不仅不影响内容，还可提高质量。请看我们前辈学者的文章，少有那么冗长的。

第三个希望，是《考古》能更多地安排书评，最好做到重要的著作和报告都有评论。国际上学报性质的刊物，几乎一定要设立书评专栏，有的篇幅占到半本，是大家都熟悉的。同时评论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只说什么“填补”了某种“空白”云云。这一点大家都晓得，然而好像就是做不到。《考古》如能再做努力，在风气上来一个突破，必能更多得到读者的赞扬。

化的定名问题》，《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等。关于碳十四年代测定问题，更是殚精竭虑。先是介绍碳十四测年的原理及其在考古学中的作用，继而招延后才，自力更生地创建起全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的实验室，待积累到一定数量的测年数据后，又率先示范，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为新中国的史前考古的年代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来考古所后在第二研究室工作，长期在外发掘，凡有重要发现，均在《考古》发表简

报，偶有小品，亦备选用，聊尽绵薄之力耳。

现下，人到六十就要退休。而刊物则

老而弥坚。我坚信，有全国考古人的呵护，《考古》必将叶茂根深。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今年是《考古》杂志创刊60周年。60年来，《考古》发表了数以百计的重要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简报，更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影响，《考古》不仅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也因此跻身国际知名刊物的行列。现在，研究中国、东亚乃至全球古代史的综合著作，大都离不开《考古》，它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就新石器时代考古而言，裴李岗、磁山、兴隆洼、上山、半坡、庙底沟、大汶口、马家浜、崧泽等一系列举世闻名的遗址是通过《考古》最先被人所了解的，中国史前文化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元对立，发展为仰韶-龙山-二里头-商文明的一元论，再发展为多元一体的多元论，也多是在《考古》这个舞台展开

杨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月刊1955年创刊时名称是《考古通讯》，是双月刊，那时我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1958年秋我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先在丹江水库工地进行了一个季度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冬天返所后开始参加考古研究所编辑室工作，立即投入《考古通讯》改刊为《考古》月刊的准备工作。1959年正式改版，具体编辑工作由周永珍、徐元邦和我负责。

当时在“大跃进”的政治形势下，《考古》改刊工作曾受到很多干扰，有人力图争夺刊物的领导权，改变刊物的学术性。但在尹达、夏鼐两位的坚持下，刊物终于按正确的方向前进，夏鼐先生亲自撰写了改版后首期致读者的《编者的话》，指明《考古通讯》改名为《考古》后，希望能够做到适应

的。也可以说，我们对中国史前考古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更多是通过《考古》获得的。

《考古》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考古学成长壮大的一个缩影，一种见证，也是引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舞台。现在，虽然调查和发掘简报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各种研究论文，特别是采用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众多研究成果，也在《考古》上占有越来越多的比重。许多新技术，从碳十四测年、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到残留物分析等等，也多是通过《考古》在中国考古界得到了广泛的认知。作为现代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我希望《考古》以更严谨、更开放、更多样化的姿态从容地走向世界，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她的第二个甲子的到来。

祝愿《考古》青春永驻，越办越好！

考古工作的新形势，建立中国考古学体系，积极开展综合研究，更多的报道好田野工作和资料整理工作，交流工作经验。决心和全国考古工作者一起共同办好这个刊物。从此，《考古》月刊一直坚持学术性和群众性的办刊方针，以刊出的学术论文和工作报告（主要是及时的考古简报），以及有组织的学术讨论，影响和引导全国考古工作，促进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过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导致《考古》停刊，1972年才得以复刊，1973年我又回到编辑室，继续参与月刊的工作。及至1988年，徐莘芳担任所长，对编辑室进行调整，编辑室只留下编辑职称的人，所以我离开编辑室返回汉唐研究室。虽然不再具体参与月刊的编辑事务，但并没有切断与《考古》月刊的

紧密联系。可以说我为考古研究所服务的历程，正是与《考古》月刊的发展同步的，《考古》月刊改版至今已经56年，这也是我从事考古工作的56年。不同的是，按照人生自然规律，我已衰老退休，但《考古》月刊

赵 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今年是《考古》创刊以来的第60个年头。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也经过了60多个年头。作为专业学术期刊，《考古》见证和忠实记录了这一不平凡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考古大落大起，重整旗鼓开展工作。但也应当看到，在史前考古领域，它秉承的学术逻辑相当清晰，即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这门西洋学问在中国落地以来，经过将成熟于西方学术环境的技术方法中国化和明确了通过考古学物质文化面貌的差异探索中国历史脉络这个基本思路之后，中国考古学在重建史前时期物质文化发展过程这个大方向上的努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期间，虽然发生过有关仰韶文化为母系还是父系氏族的争论，也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非常时期的政治干扰，还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困惑犹疑，但自从夏鼐先生发表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以来，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分区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始终是主流。

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60年前，夏鼐先生和老一辈学人曾反复酝酿创办《考古》的必要性及其宗旨与定位。《考古》发刊词对创刊的缘由和目的都有说明，其中，有两条方针我认为决定了《考古》60年的发展：一是“面向全国”，二是“学术性”。《考古》虽由考古研究所主办，但一经创刊就面向全国，并以推进中国的考古事业为己任。1959年《考古通讯》改名《考古》、创刊200期时夏鼐先生再次强调研究论文和田野考古报告两者并重，如此种种，使《考

古》永葆青春，一直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着中国考古学术研究的新潮流。

现在《考古》月刊迎来60周年华诞，谨此祝愿刊物顺应历史潮流，在新时期继续引导中国考古学向新的学术高峰迈进。

而“区系类型学说”的提出，则进一步突出了整体性归纳总结之于认识把握史前历史大脉络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围绕这个考古学阶段性任务的发现与研究，是这个阶段包括《考古》在内各种学术出版物的主体内容。

尽管重建物质文化史的基本任务至今也不能说已经完成了，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明确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课题后，学术界的兴趣悄然转向这个本质上是关于史前社会的复原与研究上来了。而我们也看到了，随着对这个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聚落形态的田野考古资料，文明理论的探讨，动物、植物考古等新领域的开拓和DNA等大量新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文献、论述，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当下学术刊物的版面上。

因此，《考古》不仅仅记录中国学术的发展，也一直引领着学术的方向。借此甲子初周之际，我衷心祝愿这份刊物与时俱进，永葆青春，前程远大！

古》作为学术刊物的定位愈加明确。

检索《考古》60年来刊发的内容，除特定历史时期外，这两条方针总体上都得到了坚持。正因如此，《考古》才始终被公认为全国性的学术期刊，《考古》也才能进入国外著名的大学、博物馆和科研机构，海外发行量在中文期刊中长期名列前茅。与创刊时相比，今天的学科发展和研究背景已发生很大变化，但《考古》坚持这两条方针依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今后的《考古》还应有更高远的目标。《考古》也需要“面向世界”，面向全世界的作者和读者，面向世界考古学。只有把中国考古学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下，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和自身。在坚持《考古》的“学术性”时，我们的目光不仅止于

宫本一夫（日本九州大学）

学术期刊《考古》迎来了甲子诞辰。值此之际，我谨表示由衷的祝贺。对于解放后的新中国考古学来说，《考古》为考古学资料的发表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作为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外国学者，贵刊一直是获知中国考古学新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外，《考古》也是研究性文章的发表场所。因此可以说《考古》是能够时刻反映中国考古学科研水平的一面镜子。如此说来，时至今日通过阅读《考古》仍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考古学学术发展的情况。

中国大陆作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地区之一，不是仅仅拥有重要的遗迹遗物，如今在前述的历史背景下，这里也是可以获得丰富的科学考古发掘材料的地区。此外，中国考

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发掘和研究一处遗迹、一个遗址、一个文化或类型，实际上就是揭示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一段人类历史。如果说当年通过对发掘出土的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研究，可以从时空框架上把握各个考古学文化的位置及古迹的形状特征，发挥证经补史的作用。那么现在通过把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物质成分和结构分析等科技考古多个领域的研究聚焦到考古发掘的遗址上，则可以科学地再现考古学文化及遗迹的绝对年代，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演变及与之相适应的人地关系，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健康状况和风俗习惯，包括动植物在内的各个时

刊发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应注重刊物自身所坚持的学术精神，以及在办刊工作中传达出的学术理念。

寄希望于《考古》能面向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以探索知识、探索真理为己任，成为世界性的学术刊物。

古学领域中科技考古的迅速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与世界考古学相比也毫不逊色。毫不保留地说，现代的中国考古学已成为人类历史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

作为世界考古学主要支脉之一的中国考古学，在未来的60年里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其中《考古》期刊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以往贵刊在彩版印刷等编辑工作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今后编辑方面各种新规则的应用也是发展的趋势。例如电子期刊的制作等，进而作为免费共享的学术资源面向全球开放，这样的发展方向是我所乐见的。至此，我谨祝贵刊越办越好，同时也祝愿中国考古学的科研水平更进一步。

期人群的食物结构，古代采集渔猎、植物栽培、家畜饲养等一系列食物资源获取方式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古人制作各类器物时原料的获取、工艺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城市形制及建筑物的营造工艺的特征和变迁，古人在不同时期进行丧葬和祭祀等宗教活动中使用动植物种类的特征，文化与文化之间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等等。以科技考古的研究结果为基础之一，与考古学的其他相关基础研究结果相结合，由此进一步凝练为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成果，这样的研究层次及内容，才能真正步入21世纪世界考古学发展的前列，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自己独到的作用。

希望走过60年光辉历程的《考古》继续以发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发掘简报、报告和论文为特色，进一步发挥服务考古学、繁

荣考古学、引领考古学的重要作用，更加注重科学性、突出理论性、强调全面性、增强规范性，再创新的辉煌。

高 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考古》走过了60年的历程，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学术成果及思想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该刊近年登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简报与论文明显增多，成为常常游离于考古主圈之外的该领域融入主流、将我国考古学不同时段融会贯通的重要桥梁。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以地下的实物资料为对象，研究远古人类的演化过程、规律和机制的一门科学，其关心的核心内容是古人类的技术、行为、生存方式等社会属性。这一学科研究的时限占据人类历史的99%，目前的热点课题包括现代人群起源与扩散，农业起源及前期的知识、技能储备，旧石器时代文化及区域传统的成因，气候变化与人类适应过程等。我国在这一领域呈现新的发展趋势：田野技术和信息提取精度与国际接轨；多学科交叉协作；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

带来诸如动物考古、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食谱分析、原料分析、用火分析等分支领域的拓展；某遗址或区域高分辨率文化序列的建立；定量、实证分析取代定性、主观判断；透物见人，从描述器物转变为关注人类行为；聚焦学术热点，致力理论阐释；国际性加强，中国特色减弱。

该领域的发展仍然存在着困难和挑战，包括定位与归属尴尬，在考古学科中被边缘化；队伍过小且不均衡，高校中缺少合格的师资力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材料整理滞后，共享难度大。要克服这些困难使其得到长足发展，业内人士需要加倍努力，国家在资源配给和队伍建设方面应给予重视，而像《考古》这样重要的行业学术期刊的承载与引领，也会发挥独特的作用。

黄展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创刊60年的经历，与国家的时局变化大体相一致。新中国成立初期，考古力量十分薄弱，为配合基本建设，1955年创办《考古通讯》，为双月刊。“发刊词”只要求“多登一些各地有关发掘、清理和调查的简讯”，“介绍一般的考古知识”。随着各地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开展，考古工作蓬勃发展，1958年改为月刊，1959年改刊名为《考古》。各地编写的田野发掘简报大多集中到《考古》上发表。虽然政治运动不断，《考古》尽力配合，发表不少紧跟运动的“时文”，却屡遭指责“紧跟不够到位”，甚或勒令停工自查。但总体来说，《考古》在“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上处于平稳发展阶段。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考古》被停刊。1972年率先复刊，退为双月

刊。在极“左”推手管制下，经过一段艰难痛苦的复苏时期。幸得“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出现改革开放。1983年《考古》恢复为月刊，从此走在拓展与创新的路上，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社会科学刊物之一。回想过往，不免留有几分心酸。

20世纪80年代，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各省区、市县，纷纷成立文物考古所、博物馆，自办考古文博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呈现百花争艳、百舸争流的局面。其中有不少刊物已崭露头角，广受世人的瞩目。在此情势下，《考古》已不可能停留在过去“荣誉”、“老大”的座位上，不努力进取创新，就可能要落后“挨打”。我离开编辑工作已久，仍深有感触。希望《考古》保持和发扬过去比

较好的来稿审批制度，帮助作者改稿改图，与作者建立平等友好关系，顺应时势，改变过去坐等来稿为积极对外征稿约稿；有计划地组织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共同探讨有争议

的疑难问题或新问题，扩展考古研究领域；加强与同类刊物的联系，互通信息，互相支持，取长补短，为繁荣考古事业，提高考古研究水平而努力。

梅建军（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关于冶金与早期中国文明发展的关系，近期的学术研究大致有这样一些趋势：一是淡化冶金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认为冶金术的出现并非文明发生的必要或基本因素；二是认为青铜冶金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很可能受到了来自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影响或刺激；三是提出青铜冶金术与业已存在的礼制传统的结合，导致了组合陶范铸造技术在中原的兴起，从而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尽管这些见解尚难称定论，但其展现的活力与生机，正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生动写照，而《考古》置身其间，先知先觉，时时引领着时代的先机。

我清楚地记得，1993年，安志敏先生在《考古》上发表了《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

一文，首次明确提出冶金术经史前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可能性。该文在海外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美国宾州大学的梅维恒教授很快就将安先生论文的结论译成了英文，并通过当时刚刚出现的电子邮件四处散发。可以说，安先生在当时发表这样一篇文章，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学术远见。20多年过去了，安先生的一些重要学术见解正一一得到验证。回头看，《考古》在重要的学术转折期引领了时代趋势，对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冶金研究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功莫大焉！

值此《考古》创刊60周年，谨撰数语，诚致祝贺！

（责任编辑 杨 晖）

○信息与交流

《考古》入选2015年“百强社科期刊”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建立和完善报刊评价体系和引进激励机制，实施精品报刊工程，重点培育和推出一批具有较强舆论引导能力、传播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优秀品牌报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开展了2015“百强报刊”推荐评选活动。近日，评审结果在向全社会公示后正式发布，《考古》入选“百强社科期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予以表彰并颁发了证书。

近年来，《考古》曾先后荣获“'95优秀社会科学理论期刊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

期刊奖”（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一等奖”（1999、2002、2006、2008年）、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2011年），被评为“全国百种重点期刊”（1998、2003、2013年）和“双百期刊”（2001年）。今年恰逢创刊60周年，《考古》又再次入选“百强社科期刊”，这是对刊物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进一步激励。今后，《考古》将继续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和办刊宗旨，发扬传统、积极创新，努力服务学术、引导学术，为中国考古学的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本刊编辑部）